

2015 经济前瞻:改革红利集中显现

■王子约 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定调意味着 2015 年将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中央将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运用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着力解决新问题。

从多个机构和多名专家的预测来看,经济下行的压力将会持续到明年。但不少受访者对记者表示,对增速过于关注本身是一种过时的观点,明年更应该关注调结构所激发的动力,这将决定着中国经济最终能否实现升级。

作为推进改革最主要的部门,国家发改委刚刚结束的年度工作会议部署了明年的主要工作。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保持经济合理运行,加快机制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将成为明年的重点。

另一方面,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及重要部门的表态来看,财税和金融将在明年有重大动作。一名官方机构研究人士对记者称,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已经和当前经济情况不相匹配,可以说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稳增长继续加码

下行压力对今年的中国经济来说一直如影随形,尽管有关部门一再表态今年主要经济目标将圆满完成,但不少机构也预测这种压力将延续到明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近日对媒体表示,总体上,中国经济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未来投资增长将回落为 10%~11%,消费增长约为 10%,出口增长回落为 5%~10%,GDP 增长为 6%~6.5%。



刘世锦认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仅研究了经济起飞的问题,但对于飞行持续性问题还没有很好的政策分析框架;目前的趋势分析只是经验观察,构建理论需要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刘世锦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特别依赖要素生产率,要进一步通过部门间转移和部门内要素配置来提高生产率。

在发改委制定的明年八项重点工作中,“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排在第一位。有接近高层政经观察人士对记者称,除了继续加快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外,发改委短期稳增长的“功夫”应该还是集中在引进投资方面。此前,发改委已经启动实施了七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围绕“投

什么”、“谁来投”、“怎么投”3 个重大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改革和探索。

不完全统计发现,自 10 月 1 日至今,国家发改委已批复 43 个项目,涉及机场、铁路、公路、城市铁路项目,投资额度超过 13000 亿元。

调结构进入发力期

强调稳增长之外,发改委还提出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机制创新和结构调整;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打造发展空间新格局;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加强规划编制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研究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结构调整促增长的阶段,以部门多元化为特征的结构调整初见端倪,经济结构转换的三支柱是灵活有效的要素市场、反应灵敏的企业、训练有素的劳动者。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7.4%。前述观察人士对记者称,在 GDP 的后面,还应该看到今年城镇就业持续增加、消费价格总体稳定、货币信贷增势平稳、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这些良性变化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动力所在,今年许多改革都埋下了伏笔,明年是改革大年,同时也是各项改革开始发挥功效的时期。”上述观察人士说。

从数据来看,中国的改革已经看到了一定效果。作为政府的首推政策,简政放权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活力。工商登记制度的改革表现亮眼:不仅是全国新注册企业数量呈现井喷态势,就业在今年 11 月份已经新增 1000 万,提前完成年内目标。

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整个 2013 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 36.1%,是拉动就业最大的产业门类。2014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46.6%,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1.3 个百分点。

2014 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是 54.4%,拉动 GDP 增长 4 个百分点,已经超过投资和净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前述观察人士称,释放市场活力的改革是明年经济领域的最大看点。此外,随着两个“2020 年目标”的临近,民生方面的改革也会加快。

全球价值链统计 诠释中国“勤而不富”

■郭丽琴 报道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中国贸易总量和顺差那么大,但从中挣得的利润却并不高?

这便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决,但全球价值链试图解释的问题。

商务部 23 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下称《核算报告》),引入全球价值链理论,构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数据体系。

《核算报告》发现,2012 年,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中欧贸易顺差、中印贸易顺差分别下降 54%、56%和 36%左右。此外,我国单位货物贸易出口的增加值总体偏低。2012 年,我国每 1000 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为 621 美元,美国为 850 美元,欧盟、日本则介于 700~800 美元。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日等国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与统计都非常成熟,而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有效推进。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现在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主动牵头推进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其中,正与美国等经济体,世界贸易组织(WTO 等国际组织一起合作,推进数据库完善与数据测算。

上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周便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曾在 APEC 会议周期间公开表示,中方今年将全球价值链的议题首次引入了 APEC 的合作议程。APEC 会议成功地制订了 APEC 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合作战略蓝图,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制定全球价值链政策性、纲领性文件的区域合作组织。

中国为何勤劳而不富有

从《核算报告》披露的情况来分析,由于中国目前的贸易结构是以加工贸易、货物贸易、中低端机械电子类为主,这些都限制了中国从价值链上获得的国内增加值的数量。

从商品类别来看,机械制造产品、电子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石油化工产品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低(400~700 美元)。2012 年单位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385 美元左右)不及一般贸易出口(780 美元左右)的一半。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位服务出口拉动的增加值远高于货物出口。

服务贸易的增加值以 2012 年为例,我国每 1000 美元服务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为 848 美元。从服务贸易分项目看,高附加值服务项目为通信服务、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服务和特许权使用和许可费用相对较低。

让人意外的是,农业、纺织服装、食品、家具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以 1000 美元计)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高(800~900 美元)。

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顺差大幅减少。

核电重启： 国内投资空间与技术环境分析

■王秀强 报道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我国已将沿海核电工程列入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包,将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启动一批沿海核电工程。这是最近以来核电重启明确的表述。

福岛事故之后,国内核电项目审批暂停。2014 年以来,重启国内核电项目审批的信号不断释放。

核工业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目前看,能源结构调整亟需核电出力,国内经济也需要核电装备的发展来提振,加之国内新一代核电技术取得突破,安全发展核电的战略不会改变,只是时机选择问题。

而核电发展的重心是对在运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对现有核电技术路线做改进融合,推进核电装备“走出去”。

核电审批重启，年均投资 700 亿元以上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明确了未来核电发展的市场空间。《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提出,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项目建设,研究论证内陆核电建设。到 2020 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5800 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

根据国家能源局权威数据,目前我国运行核电机组 21 台,装机容量 1902 万千瓦;在建的核电机组有 27 台,装机容量 2953 万千瓦,在世界上在建机组数排第一位。当前 4855 万千瓦的容量与 2020 年 8800 万千瓦投运和在建规模有较大差距。

行业内的多数预计是未来六年,国内每年将有 6 台左右机组(每台机组容量为 100 万千瓦)建设。以每千瓦 1.2 万元投资计算,核电年均建设投资规模将在 700 亿元以上。核电站建造将为核电设备制造企业带来商机,核电站建成后需要大量设备维修以及核燃料生产和后处理企业的服务。

从当前能源结构调整的范畴看,中国提出 2030 年非化石能源达到 20%,核电将要在非化石能源发展中贡献较大的力量。目前,核电在中国能源中所占的比重还远远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全世界的核电占电能的比重大概是 15%左右,中国核电占比仅 2%左右。

核电大幅发展的空间为民资进入提供可能。11 月 26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意见特别指出,在确保具备核

电控股资质主体承担核安全责任的前提下,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核电设备研制和核电服务领域。

由此可见,除核军工核心科研生产外,与核电相关的设备研制均将为民企进入敞开大门。这些领域包括,核级密封件、电缆、阀门等设备领域,射线检测等服务领域。

核电技术路线“三足鼎立”，竞合关系常态化

长久以来,国内核电技术路线呈现“三足鼎立”的状态,无论是中核、中广核,还是国核技术公司均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分别为中核的 ACP1000、中广核的 ACPR1000 + 和国核技的 CAP1400。

今年 8 月 22 日,“华龙一号”通过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核安全局联合组织的设计审查。“华龙一号”核电技术,指的是中核 ACP1000 和中广核 ACPR1000+两种技术的融合,被称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路线”。

“华龙一号”的定位是对外输出技术,在反应堆、燃料元件、辅助系统等方面可以完全做到自主运营、建设。近期,国家能源局先后批复中核福清 5、6 号机组“华龙一号”技术方案,及中广核防城港二期工程技术方案。

尽管华龙一号是中核、中广核两家技术融合形成,但在技术专利、核电站项目收益方面两家预计仍需要磨合、博弈。

在此之前,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引进三代核电技术 AP1000,被视为国内主流的技术路线,但三门、海阳的四台示范机组存在不同技术问题,项目工程延期。同期,华龙一号技术方案落地,使国内核电市场有更多的选择。

预计,未来国内核电领域多个技术路线仍将共存,包括华龙一号、CAP1400、EPR,以及高温气冷堆等四代核电技术,每一项技术均有不同特点,在各自示范项目建成后,投资者可以根据安全性、经济性等要素选择。

力推核电“走出去”，管理格局可能调整

与高铁相似,核电是国内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代表产业。推进核电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是可以培养核电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高端制造业发展;二是整合世界核电矿产资源和市场份额。

我国核电经过 30 年发展,国内核电设备制造能力在 8 台套左右。为推进核电

出口,国家领导人开始担当“推销员”角色。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中东欧国家期间,同罗马尼亚、捷克分别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文件,并与匈牙利就核能领域合作达成共识。

今年 6 月,李克强访英期间,中英双方就核电等领域签署《联合声明》,英方欢迎中国企业继续在英投资核电、高铁等项目;7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阿根廷期间,中阿签署《关于合作在阿根廷建设重水堆核电站的协议》。

OPEC 期间,中核集团与加拿大坎杜能源公司签署了组建合资公司的框架协议,联合开拓国内国际核能市场;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与南非能源部部长帕特森签署了两国核能合作的政府间框架协议。

11 月 24 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美国西屋公司和土耳其国有发电公司 EUAS 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在土耳其开发建设 4 台核电机组的排他性协商。

目前,大国之间的核能合作范围在拓展,世界竞争也在加剧。不可忽视,在“走出去”过程中,国内核电企业在同一项目上也存在竞争关系。

为推进核电发展,未来核电工业管理体制有可能出现变化。借鉴高铁出海的经验,目前已有组建国家核电投资公司的动议,以整合资源,加强协调,统一服务国家战略。

核电挑战：人才技术、乏燃料处理设施是短板

核电在经过一轮内部调整后,等待下一轮项目重启。在新的“跃进”启动前,不得不审视核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挑战主要集中在:一是核电技术由二代向三代的过渡过程中,一些关键技术设备没有完全过关。正在建设的三代核电机组泵阀存在的问题、设计固化时有发生。

二是国内核电发展保障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法律保障体系。在我国,原子能法、核安全的有关法规,核电发展和管理的有关法规还没有正式出台;核电技术创新能力、科研投入、重要的试验手段等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要求高。

除此之外,核电产业链条中乏燃料后处理能力不足。乏燃料后处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技术复杂、投资规模大、专业领域广,是核电的配套设施。初步估计,一个 800 吨后处理大厂需要投资上千亿元人民币。随着核电发展,每十年就要建一个处理厂,需要国家和企业在建设规划和政策支持中特别考虑。

财税金融改革加速

财税、金融领域的改革已经成为防范经济风险、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内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 21 日在“中国经济年会(2014~2015)”上透露,2015 年发改委重点改革的内容将包括加强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设、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快价格改革、建立健全规范高效的财政金融体制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认为,应当重视经济结构的积极变化,尤其应当进一步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放松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解决利率双轨制问题。

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提议,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能不能加快发展中小银行,使得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够彼此得到资金的支持,并且降低融资的成本,这是十分重要的。

迟福林还表示,财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相适应。比如,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加大对与公共需求直接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投资,加大与长期消费能力直接相关的基础领域投资,以此保持投资的稳定性。同时,需要全面推行营改增的改革,要加快推进消费税的改革,这样,有利于创造扩大消费这样的环境,使得服务业能够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来保持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

以中美为例,由于中国对美货物出口中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虽然中国出口总量占优,但实际上获得的国内增加值却相对较低。2012 年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以总值统计为 2189 亿美元,而以增加值核算为 1017 亿美元,与以总值统计相比减少了 53.6%。

分商品来看,中国向美国出口额最多的两类,主要为机械电子类产品。以贸易总值统计中方顺差分别为 712.2 亿美元和 631.2 亿美元,而由于中国在这两类商品生产中绝大部分为加工贸易,所获得的增加值仅为 244.3 亿美元和 292.4 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纺织品和电子产品加工贸易出口,这也说明目前中国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为导向。

《核算报告》也显示,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水平也得到稳步提高的过程。随时间看,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部分过去主要依靠进口的零部件被有性价比优势的国内产品所替代,中国单位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加。这个趋势今后有望继续保持。

中国有意牵头全球价值链研究

2011 年起,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委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成立课题组,开展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及相关议题的系统研究。课题组对 2010~2012 年我国与六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增加值、就业拉动等情况进行了核算,完成了《核算报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记者表示,未来我国要加强和相关机构的合作,将反映加工贸易特殊性的模型与方法嵌入到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全球价值链的核算中,更准确地反映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的作用和优势所在。

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在国际上属于前沿领域,但由于专业和人力投入要求高,此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WTO 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曾经撰写过全球价值链相关报道,但并未成体系。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涉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数据缺失。目前,国际上整个运营模式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已经开始推进数据整理与全球合作,力求逐步完善全球价值链的体系、重构国际贸易图谱。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认为,全球价值链的运算方式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在整个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更多的业内人士认为,这种视角有利于洗刷中国一直以来给人以全球贸易收益最多的假象。

沈丹阳曾在上个月的 APEC 领导人会议周期间透露,中方还将与美国等经济体共同牵头 APEC 贸易增加值核算工作,对 21 个经济体的贸易平衡、产业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量化,为下一步促进全球价值链融合的政策出台奠定数据基础。此外,中方还将共同牵头“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加强国际组织等其他相关方联系,促进 APEC 全球价值链合作”两个支柱领域的工作。